

促动科技助残

需要更多数据开放,更多群体参与

2024 年5月19日是第34个“全国助残日”,主题是“科技助残,共享美好生活”。那么,城市

应当如何运用科技手段,支持身心障碍者的工作和生活,甚至从中生发出更多创新成果,令所有人的福祉提升?背后的问题是,“无障碍城市”的建设能否贴合身心障碍者的生存和发展的需求,真正为其去除一路上的阻碍。

”

2023年9月,《中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》(以下简称“无障碍法”)正式实施。此前,深圳2021年发布的《深圳经济特区无障碍城市建设条例》,是中国首个“无障碍城市”的地方立法。近期,深圳大学残障研究中心、公益慈善研究院周林刚教授团队正酝酿“无障碍城市指数”,准备采集相关大数据以及问卷数据,并申请相关信息公开,以便持续评价不同城市的无障碍服务和设施。

对此,近日在京举行的“中国无障碍指数编制专家论证会”上,来自不同方面的专家,提供了诸多建议。实际上,结合我们自身在城市中的见闻和感受,不难体会到,开展这项工作时面临的一系列难点,也正是“科技助残”需要突破的。

无障碍意在支持人的自主生活

与30多年前相比,中国创建无障碍环境的工作,有了翻天覆地的进步。在这次论证会上,1960年出生的中国残联副主席吕世明回忆,自己小时候上下坡,还得靠小板凳支撑挪动;到了1980年代末,“无障碍环境”的概念逐渐为人所重视,比如,建筑需要设置坡道和扶手,门的宽度也要便于轮椅进出,等等;其后40年间,包括《残疾人保障法》在内,各种法律法规和政策逐渐完善,而无障碍法的出台,进一步从法律上确认了残障人士应有的权利。

“无障碍法的最大价值,就是让每个人都能够自己生活。宗旨是八个字:生命尊严,生活自主。”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、残疾人事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黎建飞强调。

这种权利落实在城市之

中,体现为一连串细节。中国盲文图书馆数字资源部主任唐李真提出,公共场所及其设施,需要有基础信息提示的无障碍标准规范。比如,图书馆的盲人阅览室,可以设在离门较近的位置;从大门到阅览室,有盲道以及声音引领。

在当下的媒介社会,“信息无障碍”显得更为重要。这恰是科技可着重发力支持的。2024年3月,在北京西城区民政局,一对视障新人全程无障碍办理了婚姻登记手续。二人通过摸读盲文的文件,可以齐声共同宣誓,而不再如以往同类情况那样需要第三人帮助宣读誓言。可以自主完成自己的仪式,这层支持的意义十分重要。

与此类似,不仅是身体障碍者,心智障碍者也需要能够融入城市、自主行动的一系列支持。但因为障碍的存在,这类需求往往难以被看见,需要更多社会层面的撬动。

另外,一些技术应用又给某些群体造成了新的障碍。比如,当下很多在线公共服务要经过人脸识别。而盲人、失能失智老人等无法通过人脸识别的群体,则需要其他的办法。但服务于这类群体的信息无障碍通道,目前付之阙如。

如何尽可能消除这些障碍,关乎未来每个人的生命状态。身心障碍者当下在城市中的需求,正与未来老龄社会所需的保障和支持一致。全国政协委员、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王建军指出,少子化、高龄化和区域人口增减分化,是未来客观上必须面对的状况。数据显示,中国的人口2022年净减少85万,2023年减少208万;而当下中国老龄人口已有三个亿,“十五五”期间将达四个亿,2050年前后会



2017年,上海,一场盲人电影

有五个亿。在这层意义上,无障碍法可视为城市更新建设以人为本的引领。

多年来,吕世明都会坐着轮椅,去各个城市调研,体验无障碍环境建设的状况,并提出问题和改进意见。他指出,无障碍法已明确提出“要积极构建无障碍环境标准体系,建立健全无障碍环境认证和信息评测制度”,因此,城市的基础设施、信息以及社会服务,究竟在多大程度上“无障碍”,应该有系统性的评测。如果说巨额处罚当下并不适宜,那么可以结合信用体系进行反馈。根本上,要让“无障碍”这部分的披露,带动经济增长和科技创新。这事关所有利益相关方,是否感受良好和愿意为之投入。

为各方赋能需要数据更多开放

吕世明也提到,在过往的技术条件下,缺乏可公开利用、经得起检验且系统完整的大数据。同时由于力量有限,如果只靠做抽样调查,难以撑起“城市无障碍指数”。最后便做成“城市无障碍政策指数”,即评估每个城市各自发了多少政策文件。当下,作为第三方政策研究者,制定一个经得起推敲的“无障碍城市指数”,可谓恰逢其时,但仍要一点推进。

实际上,针对“无障碍城市”的倡导和实践,在法律政策、统计数据和真实体感之间,往往存在很大差距。

在此,以深圳经济特区为例。在前述地方立法之外,深圳还制定和落实了不少具体措施。产业引领方面,作为具备创新基因的城市,深圳2017年被列为首批国家康复辅助器具产业综合创新试点地区。而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方面,继2018年发布创建无障碍城市行动方案后,深圳2019年发布了无障碍城市总体规划,2024年则细化制定了无障碍城市专项规划。

但是,只通过财政投入和基建成果等方面的数据,恐怕难以

衡量城市真正的“无障碍”程度。城市是一个复杂系统,对身心障碍者而言,在城市中可去到的地方、能收获的人生经验,会受到城市中的短板限制。这些短板未必能被广泛知晓和有效覆盖,甚至还会被表面上的数据所掩盖。

这意味着,在“无障碍”方面,关键要看城市还没有做到什么,以及为什么没有做到。就拿记者在深圳的出行感受来说,由于马路上并未设置自行车道等原因,电动二轮车的骑行者常在人行道上行驶,其中不乏快递和外卖骑手。加上人行道往往宽度有限,就连健全人步行也常觉心惊胆战,用盲杖的人、拄拐杖的人以及轮椅使用者,更是难以下决心出行。这意味着,尽管公交汽电车专门设置了无障碍踏板,以及可刷盲人智能手机的售票设备,改造与采购所耗不菲,但要让残障人士能享受相应便利,因为路上环境复杂,仍然障碍重重。

与此类似的是,尽管城市修建了5000多公里盲道,但视障群体走在人行道上,也会因电动二轮车驶过身旁感到不安全,且盲道往往被其他物体占据,另有部分盲道画在相对偏僻的地方,无助于支持视障群体畅通穿行城市。以上种种,令城市“无障碍”的真实体感与一系列公开数据之间形成差距,也让“无障碍”相关投入的效用降低。

不只是深圳,其他城市也不同程度存在这类状况。周林刚也提到,要编制这项无障碍城市指数,难点就是数据公开。比如,每个城市可取得的数据不同,即便是看起来同样的数据,其口径也不同;针对不同的残障类型,现实中又需要提供不同方面的支持,其效果难以通过统计数据衡量。

也就是说,这项工作还需要更多部门的开放数据,以及更多社会层面的连接渠道,通过不同层面的大数据来梳理。只有以实际使用的过程进行反馈,才能推动相关产业围绕未来城市空间的无障碍设计进行,以最大程度使城市的无障碍实现落地操作。

或许,新组建的国家数据

局,这方面可以有更多作为。“数据要素X”大赛正在举办,或许可以推动更多部门、更多维度的数据开放,让更多数据要素可以为研究者、实践者所用。

专业主导持续扩大公众参与

“无障碍城市”关系到所有人的未来。要推动城市进一步“无障碍”,在条例实施和产业发展之外,还需广泛纳入社会公众参与的维度。

上海的傅小米是一位二级肢体残疾人士,有行走能力,但外出需要电动轮椅支持。在不同情境下,他对科技支持的需求也不一样。比如,在居家环境中,需要考虑如何独自做饭、洗衣服和清洁身体;而在公共环境中,因室内场所无法精确导航,不知前方能否容许轮椅通过,他往往感到十分困扰。傅小米认为,需要明晰什么是“障碍”,才能对“无障碍”有深入的理解。

“在解决方法的逻辑层面,寻求软件硬件配套是可行的。开发者一定要深入了解残障人群的需求,多去田野调查,才能获得真实的资料。”傅小米主张,如果创业者选择残障主题,那一定需要残障群体深度参与,甚至是作为合伙人一起创业。

这让人联想到,服务听障人士的语音APP,创始人石城川就是一位从小在无声世界中摸索的听障人士。作为创新和创业的课题,这种对障碍的察觉和支持,也可以扩展到更多感知觉领域。

“无障碍”的关键在于对人的关怀。王建军指出,2000年之前所建的房子都不适合老人,适老化改造的投入会非常大。这意味着,需要转变治理体系和治理方式,考虑全人群全生命周期,以往更多考虑对物的投入,现在要更多投资在人的服务上。

在城市层面,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副教授李迪华认为,城市能否推动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,是达成“无障碍”最为关键的因素。也就是说,无障碍城市的指数,需要考量一个城市是否让足够多的专业人士——既具备无障碍的理念,又懂得相应的办法和技术标准,具备相应的职业能力——来做包容性的社会建设、环境的改造和服务的支持。把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去做,这件事就成功了一大半。

“无障碍的理论和实践要与时俱进,包括硬件的无障碍和软件的无障碍。中国人常说的祝福,是‘祝平安’。平其实就是无障碍,无障碍才能确保安全。”深圳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、北京大学讲席教授俞可平总结,无障碍的指数能体现社会文明的程度,这事关每个人能否更加幸福。

(据澎湃新闻)



2024年夏,上海嘉定客运中心,路上的盲道被电动二轮车占据